李宝军，陈秋霖，王博．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甘肃、宁夏2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4）：103-113.
LI Baojun，CHEN Qiulin，WANG Bo.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trust on farmers multi-level happiness——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Gansu and Ningxia［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3，22（4）：103-113.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3.04.009

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甘肃、宁夏2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李宝军[1]，陈秋霖[2]，王博[3]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2.四川农业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4；3.兰州大学 县域经济发展研究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基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972份农民调查数据，利用二元离散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政治信任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指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593个百分点，政府信任与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政策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政策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334个百分点，政策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公职人员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614个百分点，公职人员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破除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心理防线，降低农民对政策的误解及疑虑，弱化农民与公职人员之间的隔阂将是提升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重要策略。

关键词：政治信任；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幸福感指数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3）04-0103-11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群体一直都是国家发展战略关注的焦点。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以及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持续推进，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民的需求层次和标准也随之变得越来越高，而且城镇化、信息化和城乡差距对农村的冲击使农民现实生活与理想状态出现了裂痕。如何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举措，也是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1]。在这样的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变革背景下，对农民的幸福感进行全面剖析，了解现阶段农民的幸福感现状，分析影响农民幸福感的因素，寻找农民幸福感提升的策略路径便成为了学界与政界关注的重点。

农民幸福感常被用来衡量其生活品质，是反映农村社会民生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2]，而影响农民幸福感的因素是复杂的，涉及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领域。单就农民幸福感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言，主要涉及到政治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即政治系统本身运行能够符合农民的规范性期待程度或者说农民对政府活动的理性预期程度对农民个人幸福感的影响[3]。信任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和社会政治的凝聚剂，事关社

收稿日期：2022-11-30　　**修回日期：**2022-12-19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1YB01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561221003）
作者简介：李宝军，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会团结、经济秩序和政府效能以及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存在着明显的差序现象，具体表现为社会信任呈现出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信任强度和差序结构，而政治信任则表现为由上而下、由远及近的信任向度和差序格局，即公众对中央政府和高层级政府的信任强度要高于基层政府。这种政治信任差序与民众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以政府主导的农村社会表现的更为强烈，因此揭开政治信任与农民幸福感之间的神秘面纱是新时代提升农民幸福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基于甘肃、宁夏972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政策的信任程度和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方面探讨了政治信任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与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机理，以丰富现有关于农民幸福感的研究成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理论分析框架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渴望从未止步，幸福也常被等同于物质富裕，然而物质仅代表人们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将幸福看成是具有等级结构性的复杂心理活动，认为幸福是个体的一种主观感受，它包括对生活满意程度和情绪及感情的评价[4]，或认为幸福是一种愉悦满足的状态，它是包含愉悦的情感因素和对生活满意的认知因素经过长时间结合的产物[5]。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说明了幸福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开放系统，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和层次对其进行分析评价。基于心理学已有关于幸福感评价的相关研究，从农民的生活满足、身心健康和自我发展能力三个层次对农民的幸福感展开评价与分析。具体而言，生活满足是农民个体对自己一段时间以来整体生活质量的一种主观认知，身心健康作为农民个体的一种可行能力包括身体强健和心理健康两个部分，自我发展是农民个体对自身发展状态的现实审视及未来发展的监督和规划。

政治信任与社会民众的幸福感密切关联。信任不仅存在于私人领域，也存在于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领域，发生在特定政治体间的信任便是政治信任[6]。政治信任与政治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政治信任通过促进民众参与政治决策和政治管理使政府更加民主。政治信任一般发生于民众自身的政治交往、政治认同等过程，而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政治预期是一种超越性和自由性的认知活动，它可以促使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度增加，对政府更加理解和信任，提升民众与政府在公共领域的合作，这有利于集体决策更好的被民众接受[7]。政治信任通过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和促进民主体制的不断完善，能够提升民众的社会归属感，充实民众的政治精神生活。从政治体系出发，可以将政治信任的具体涵义理解为民众对政治体系的期待、支持和认同[8]，即政治体系运行是否符合民众的规范性期待。基于该涵义，实证研究在对政治信任进行测度时主要遵循两种进路，一种是测量公众对现有政治体制及其运行原则的认可，主要是民众对政府、政策及公职人员的信任[9-10]，另一种是测量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主要涉及民众对中央、省、市等政府机构的信任[11-12]，本研究在对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进行测量时更倾向于第一种进路。

本研究在对上述有关农民幸福感和政治信任的概念清晰界定和研究范围明确基础上，构建的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状态与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理论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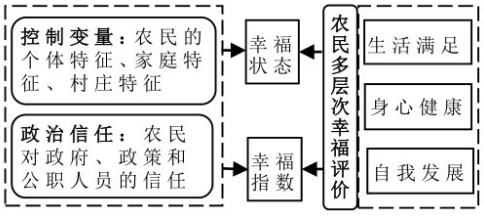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分析模型

（二）研究假说

政府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政府信任是民众对政府机构运作是否符合其心理期许所持有的一种信心或信念，是民众的一种主观感情色彩，能够映射出民众对政府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反应[13]。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不仅能够提升民众自我履行职责的意向，也会激励政府部门进一步更好地运作，政府活动的推进阻力也会减少，民众也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政府机构与民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民众对政府号召的积极参与有助形成融洽的政治生活氛围，政府机构的良

性运作以及广大民众对政府活动的积极参与有助于增进民众对自身整体生活质量的积极评价。对应到农村社会急剧转型、价值多元、制度改革不断推进的现实场域，农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显得尤为重要，政府机构不仅需要农民的积极信任来促进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推进，农民也期待一个真正注重农业生产、重视农村发展、关心农民生活且值得自己信任的政府来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福祉。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_1：在农村社会急剧转型、价值多元、制度改革不断推进的现实生活中，农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会对农民个体的多层次幸福感产生影响。

政策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其能否得到民众的普遍信任是决定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14]。政策信任是衡量民众对公共政策认可和支持程度的重要工具[15]，良好的政策信任能够增进民众对政府合法性的认知，有助于促进民众同政府合作，提高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响应，促进社会经济发展[16]。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公布的政策条文与实际的政策实施往往存在不一致，民众一般会对中央政策的动机和目标导向给予正面评价，并表现出较高的政策信任水平，但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民众会对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进行情景依赖性评价，以致社会对政策的信任出现“央强地弱”的差序格局。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和一系列配套惠农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信任的差异使农民对政策的设计、运行和福祉提升效果评价产生心理落差，降低了农民对政策提升个人福祉的心理预期。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_2：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和一系列配套惠农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民对政策的信任程度会对农民个体的多层次幸福感产生影响。

公职人员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在社会交换理论看来，交换双方潜在的信任是产生和维持交换关系持久性和扩展性的基础，因此没有信任的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17]。在政治系统运行中，民众对公职人员的信任和赋权是民众与公职人员交换关系的体现，民众对公职人员的信任是赋权公职人员的前提，由此公职人员的腐败便成为社会民众所关切的方面。利用公共职位谋取私人利益的腐败行为对民众来说是一种不平等的遭遇，这种不平等遭遇会导致民众的主观幸福感下降，而那些不平等原则的获益者在无其他心理和外在压力的前提下其主观幸福感可能会增加[18]，但问题在于腐败行为对于资源的不公平攫取往往限于少数掌权者，绝大部分民众都是公职人员腐败的受害者。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共政策维护民众福祉的基本原则，还造成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和质量低下，直接危害社会民众的生活质量。在推进农村资源下沉、服务提质增效过程中，农民对公职人员的腐败认知直接关乎其对生活整体满意度的评价和对未来的预期，一个公职人员相对清廉公信力较好的政府部门会提高农民的幸福感，而一个公职人员腐败公信力较低的政府部门会降低农民的幸福感。基于上述讨论，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_3：在推进农村资源下沉、服务提质增效过程中，农民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会对农民个体的多层次幸福感产生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使用数据来源于2020年2月至6月在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酒泉市金塔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固原市原州区的12个乡（镇）75个村庄的农民幸福感现状社会调查。为了使调查的样本更具代表性，本次社会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按照省（自治区）、县（市）、乡（镇）、村四级依次抽样，以村为抽样单位对农民开展入户采访式抽样调查。在具体入户采访时，按照Kish表的方法抽取16周岁以上农民受访者进行采访，如果受访者的文化程度较高，采用自填问卷的方法，反之则由接受培训的调查员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式采集数据。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了人口统计学与村庄相关信息、农民的幸福感状况、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等方面内容。本次抽样调查共收回样本问卷1024份，有效问卷972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5%，抽样调查整体情况良好。

受调查农民样本的基本特征。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样本分布比例为48.66%和51.34%。

在抽样的75个村庄中11个村庄在扶贫攻坚时期被评为贫困村，抽样的村小组规模平均为133户居民，抽样村庄中通有公交车的村为28个，村庄附近存在比较严重污染源的村庄有10个，村庄内部居住少数民族的村庄有26个。在抽样的农民样本家庭方面，贫困户家庭占到37.93%，移民搬迁家庭占到14.12%，抽样农民家庭的种植业收入平均为8242元，养殖业收入为6011元，其他经营收入为3198元，抽样农民家庭中患有慢性疾病的家庭占比为34.63%，家庭成员中有被确诊为患有重大疾病或残疾人的家庭占比为15.12%。在抽样农民样本中，男性占比为65.28%，女性占比为34.72%，已婚样本占比为88.02%，拥有技能的农民样本占比为30.81%，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农民样本占比为17.60%。从农民样本基本状况来看，本次调查的农民样本分布比较均匀，满足定量研究的条件。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开放系统，是个体对自己生活领域各方面的积极评价[19]，因此可以从不同的层次和维度对农民个体的幸福感进行评价分析。本研究参考已有关于幸福感测度研究文献[20-22]，从生活满足、身心健康和自我发展三个层次出发构建了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测度体系，具体在生活满足层次选取知足充裕、心态平衡和社会信心三个维度观测指标，在身心健康层次选取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家庭氛围三个维度观测指标，在自我发展层次选取成长进步、目标价值和自我接受三个维度观测指标。基于上述指标体系，本研究按照多数指标满足原则识别农民样本是否处于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利用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加权测度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用以反映农民的幸福程度。

核心解释变量。在政治心理学研究领域，政治信任被看成是民众对政治系统运行的信念或信心[23]，是民众对政府、政策和公职人员可信程度所采取的一种信任判断或政治评价[24]。政治信任作为支撑政治系统正常运行、维持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的基础变量，通常发生于民众自身的政治交往和政治认同过程，即政治信任产生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对政府的认同和对政策的认可，以及民众对公职人员的了解和交往感受。在相关实证研究中，测量民众对政府、政策和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便成为一种获取政治信任变量的重要进路，按照该条路径从农民对政府、政策和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三方面获取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变量。具体来说，参考有关政治信任研究调查问卷，本研究从农民对政府、政策和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三方面设计了本研究所需的政治信任相关问卷调查题项，各指标题项均使用五级李克特量表，信任程度从1（强烈不信任）到5（强烈信任）逐级增加。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相关研究[25-26]，对几个可能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个人、家庭和村庄特征变量进行控制，并根据变量特性定义为连续变量或虚拟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务农程度和是否拥有技能等。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家庭劳动力情况、家庭耕地质量、家庭是否为贫困户、家庭是否为移民户等。村庄特征变量包括村庄的类型，村庄居住分散情况、村庄民族构成、村庄交通情况、村庄环境情况、村庄经济情况等。相关变量设置、赋值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模型构建

在研究方法选取时，鉴于被解释变量包括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两个变量，并且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是二元离散变量而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是连续变量的情况，本研究选取Probit模型考察政治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之间的联系，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估计法（OLS）分析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

Probit模型。为了考察政治信任水平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之间的联系，选用二元离散变量模型进行分析，并设定如下估计方程：

$$Prob\left(Y_{1i}=1|PT_i,X_i\right)=\Phi\left(\alpha_0+\beta_1 PT_i+\beta_2 X_i+\varepsilon_i\right) \quad (1)$$

式（1）中，Y_{1i}为虚拟变量，$Y_{1i}=1$表示第i个农民样本处于幸福状态，$Y_{1i}=0$表示第i个农民样本处于不幸福状态；PT_i表示第i个农民样本的政治信任向量，即农民对政府、政策和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X_i为控制变量；ε_i表示独立同分

表1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民幸福感状态	按照多数指标满足原则识别的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处于不幸福状态=0，农民处于幸福状态=1	0.7849	0.4112
	农民幸福感程度	应用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加权测度的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	0.6923	0.2193
核心解释变量	政府信任	农民对整个政府部门的信任程度评价：完全不信任=1，比较不信任=2，一般=3，比较信任=4，非常信任=5	4.1622	0.8093
	政策信任	农民对社会所有公共政策的信任程度评价：完全不信任=1，比较不信任=2，一般=3，比较信任=4，非常信任=5	3.7137	0.8703
	公职人员信任	农民对全体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评价：完全不信任=1，比较不信任=2，一般=3，比较信任=4，非常信任=5	4.0328	0.8489
控制变量	性别	受访农民的性别：女=0，男=1	0.6528	0.4844
	年龄	受访农民当时的年龄，单位：岁	42.4959	10.6447
	政治面貌	受访农民的政治面貌：群众=1，民主党派=2，中共党员=3	1.7192	0.3870
	受教育程度	受访农民受的教育年限（不包括学前班、培训班），单位：年	6.7422	4.2582
	婚姻状况	受访农民当时的婚姻情况：未=1，已婚=2，丧偶=3，离婚或分居=4，其他=5	2.0525	0.5385
	健康状况	受访农民的身体健康情况：很差=1，比较差=2，一般=3，比较健康=4，非常健康=5	3.8588	0.9387
	务农程度	受访农民的务农情况：不务农=1，只在农忙时务农=2，边工作边务农=3，纯务农=4，其他=5	2.8686	1.2231
	是否拥有技能	受访农民是否拥有从事其他非农工作的特殊技能：否=0，是=1	0.2397	0.4273
	家庭人均收入	受访农民上一年家庭的人均入情况，单位：元	4848.112	831.376
	家庭劳动力情况	受访农民家庭的劳动力短缺程度：不存在=1，偶尔存在=2，一般=3，经常存在=4，始终存在=5	2.6338	1.2678
	家庭耕地质量	受访农民家庭的耕地质量情况：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3.1248	0.8415
	家庭是否为贫困户	受访农民家庭在扶贫攻坚时期是否为贫困户：否=0，是=1	0.3793	0.4856
	家庭是否为移民户	受访农民家庭是否为移民搬迁户：否=0，是=1	0.1412	0.3485
	村庄类型	受访农民所居住的村庄类型：普通村庄=1，城镇驻地=2，城郊结合地=3	1.2003	0.4893
	村庄居住分散情况	受访农民所居住村庄农户居住的分散程度：很分散=1，较分散=2，一般=3，较集中=4，很集中=5	3.2430	1.0972
	村庄民族构成	受访农民所居住的村庄是否有少数民族居住：没有=0，有=1	0.3038	0.4603
	村庄交通情况	受访农民所居住的村庄是否通有公交车：没有=0，有=1	0.3153	0.4650
	村庄环境情况	受访农民居住村庄周边是否有严重的污染源：没有=0，有=1	0.0936	0.2915
	村庄经济情况	受访农民居住村庄同周边村庄相比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差=1，较差=2，平均水平=3，较好=4，非常好=5	3.0296	0.7858

布的随机误差项，代表不可观测因素的汇总，且服从标准正态分布。考虑到该模型中可能存在因变量测量偏差（如政治信任水平测度指标选取不全面）、遗漏变量（如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的不易观测因素）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IV－Probit）进行估计，以消除因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具体在工具变量选取时，考到某一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与同村其他农民的政治信任高度相关，但其他农民的政治信任与该农民是否幸福并不直接相关，因此，同村其他农民对政府、政策和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满足工具变量严格外生的条件，可以作为受访农民政治信任水平的工具变量。

OLS回归模型。鉴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是连续变量，本研究采用OLS回归模型检验政治信任水平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应，本文具体设计的估计方程如下：

$$Y_{2i}=\alpha_0+\beta_1 Gov_i+\beta_2 Pol_i+\beta_3 Off_i+\sum\beta_{4n}X_{ni}+\varepsilon_i \quad (n=1,\cdots,19) \qquad (2)$$

式（2）中，Y_{2i}表示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Gov_i表示第i个农民样本的政府信任程度，Pol_i表示第i个农民样本的政策信任程度，Off_i表示第i个农民样本的公职人员信任程度，X_{ni}为控制变量；α_0为常数项，β_1至β_{4n}为参数，ε_i为随机误差项，满足相互独立、零均值、同方差的假设。考虑到该模型中也可能存在因变量测量偏差（如政治信任水平测度指标选取不全面）、遗漏变量（如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的不易观测因素）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同村其他农民对政府、政策和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以消除因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使用Stata14.0软件，首先检验了农民的政府信任程度、政策信任程度和公职人员信任程度三方面政治信任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了农民的政府信任程度、政策信任程度和公职人员信任程度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应；最后对政治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之间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政治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状态影响检验

在分析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的因素时，考虑到自变量选取的预先假设性和不确定性，所以采用逐步回归形式识别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的核心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即先将所有变量放入回归方程进行一并回归，并根据系数显著性识别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然后再将这些变量一并放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以提高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具体估计过程和结果见表2中的模型（1）和模型（2）。由表2中的模型（1）回归结果可知，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政策的信任程度和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都会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产生显著影响，表2中的模型（2）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政策的信任程度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由表1中的第三列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可知，Durbin－Wu－Hausman检验（简称“DWH检验”）无法拒绝反映农民政治信任水平的政府信任、政策信任和公职人员信任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且一阶段估计的F值为38.45，表明不存在若工具变量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基准回归结果进行解释，即政治信任变量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存在正向积极影响。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越会觉得政府注重农业生产、重视农村发展和关心农民的生活，心理上可能会更多的处于幸福状态，由此从农民的幸福状态来说，假说H_1得到了证实。农民对政策的信任程度越高，越会提高其对惠农政策提升个人福祉的心理预期，增强自身在国家发展中的存在感，心理上可能会更多的处于幸福状态，由此从农民的幸福状态来说，假说H_2得到了证实。农民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越高，越会相信权利规则和社会的公平性，对自己生存的社会环境会充满更多预期，心理上可能会更多的处于幸福状态，由此从农民的幸福状态来说，假说H_3得到了证实。

从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表2模型（2）中的回归结果显示，个体特征层次的年龄变量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年龄较大的农民经过岁月的磨砺，在生活经验和社会心理认知方面都相较于年轻的农民而言更加成熟，而且早期的劳动积累也使得的其经济压力相较于年轻农民而言更低，他们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会更加坦然，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更加积极。家庭特征层次的耕地质量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对农民来说土地质量不仅关系着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而且也是一种生活保障的基础，因此家庭土地质量的高低是农民做出生活策略抉择的重要依据，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满足感和幸福感。家庭特征层次的家庭是否为移民户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主要归因于移民搬搬迁家庭往往由于失去土地，没有稳定的就业或不能就近就业使他们缺乏归属感，进而对幸福生活不再期待。村庄特征层次的村庄类型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是因为相较于生活在普通村庄的农民而言，城镇驻地和城郊结合地的农民会有更多接触

表2 政治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状态影响回归

变量名称	Probit模型（1）		Probit模型（2）		IV－Probit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常数项	－2.0479**	0.9331	－2.0147***	0.5209	－1.1923	1.0051
政府信任	0.4120**	0.1647	0.3794**	0.1558	0.4001**	0.1694
政策信任	0.1272*	0.0723	0.1308*	0.0705	0.1427*	0.0736
公职人员信任	0.4187***	0.1538	0.4137***	0.1487	0.3490**	0.1584
性别	－0.0738	0.1441			－0.0460	0.1488
年龄	0.0097*	0.0062	0.0083*	0.0056	0.0089*	0.0054
政治面貌	－0.0640	0.1170			－0.0992	0.1200
受教育程度	0.0142	0.0200			0.0041	0.0209
婚姻状况	－0.1690	0.1189			－0.3344**	0.1334
健康状况	0.0865	0.0773			0.0453	0.0827
务农程度	0.0194	0.0573			－0.0421	0.0610
是否拥有技能	－0.2010	0.1624			－0.2828*	0.1656
家庭人均收入	0.0517	0.1129			0.0641	0.0512
家庭劳动力情况	0.0442	0.0547			0.0549	0.0565
家庭耕地质量	0.1792**	0.0838	0.1826**	0.0811	0.2282***	0.0876
家庭是否为贫困户	－0.1169	0.1501			－0.0587	0.1556
家庭是否为移民户	－0.5045***	0.1809	－0.5432***	0.1692	－0.5910***	0.1851
村庄类型	－0.3602**	0.1412	－0.4616***	0.1313	－0.3468**	0.1438
村庄居住分散情况	0.0839*	0.0571	0.0620	0.0640	0.10091*	0.0693
村庄民族构成	－0.0760	0.1543			－0.1306	0.1569
村庄交通情况	0.3748**	0.1566	0.3207**	0.1500	0.3614**	0.1614
村庄环境情况	－0.0060	0.2244			0.0069	0.2298
村庄经济情况	0.5849***	0.0927	0.5904***	0.0873	0.5699***	0.0977
LRχ^2检验		128.41***		119.96	—	
Waldχ^2检验		—		—	97.58***	
一阶段模型F检验		—		—	38.45***	
DWH检验		—		—	2.17	
样本量		972		972	972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这里的家庭人均收入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城市生活的机会，在心理上会出现明显的城市与农村生活对比反差，而且城镇驻地和城郊结合地的农民多数属于失地农民，失去土地的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忧虑，所以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都要弱于普通村庄的农民。村庄特征层次的村庄经济发展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村庄经济发展的好坏反映着居住在该村庄的农民生活环境，直接关系着农民的生活质量，自然也影响着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

（二）政治信任对农民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应分析

在对政治信任因素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效应进行分析时，为了使OLS回归符合严格外生性假设，本研究使用Stata14.0软件进行反向淘汰式逐步回归，分别用表2中的模型（1）、模型（2）表示。模型（1）表示将全部有可能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变量放入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模型（2）表示在模型1估计的基础上消除不显著的影响变量后回归的模型。考虑到模型中也可能存在因变量测量偏差、遗漏变量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使用2SLS估计检验模型的内生性。详细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中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知，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政策的信任程度和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都会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产

表3 政治信任对农民幸福感指数影响回归

变量名称	OLS模型（1）		OLS模型（2）		2SLS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常数项	0.2140	1.3354	0.1586**	0.0748	1.6091	1.7217
政府信任	0.0618***	0.0209	0.0593***	0.0204	0.0605***	0.0215
政策信任	0.0308***	0.0107	0.0334***	0.0105	0.0315***	0.0107
公职人员信任	0.0611***	0.0196	0.0614***	0.0194	0.0576***	0.0203
性别	−0.0232	0.0178			−0.0169	0.0183
年龄	0.0018*	0.0009	0.0009	0.0008	0.0019*	0.0010
政治面貌	0.0315*	0.0186	0.0224*	0.0121	0.0473**	0.0206
受教育程度	0.0048	0.0119			0.0174	0.0152
婚姻状况	−0.0277	0.0196			−0.0162	0.0219
健康状况	0.0043	0.0165			0.0122	0.0185
务农程度	−0.0078	0.0140			0.0036	0.0165
是否拥有技能	−0.0411*	0.0233	−0.0252	0.0190	−0.0289	0.0252
家庭人均收入	−0.0041	0.2071			0. 0221	0.0266
家庭劳动力情况	−0.0003	0.0065			0.0005	0.0067
家庭耕地质量	0.0419***	0.0107	0.0491***	0.0102	0.0474***	0.0110
家庭是否为贫困户	−0.0045	0.0187			−0.0012	0.0190
家庭是否为移民户	−0.0509**	0.0243	−0.0654***	0.0230	−0.0539**	0.0245
村庄类型	−0.0390**	0.0186	−0.0562***	0.0167	−0.0339*	0.0189
村庄居住分散情况	−0.0084	0.0080			−0.0059	0.0083
村庄民族构成	−0.0188	0.0196			−0.0160	0.0197
村庄交通情况	0.0131	0.0181			0.0107	0.0184
村庄环境情况	0.0164	0.0294			0.0156	0.0297
村庄经济情况	0.0801***	0.0115	0.0793***	0.0105	0.0770***	0.0119
调整的R^2	0.2625		0.2388		—	
F检验值	9.48***		18.76***		—	
Waldχ2检验	—		—		16.63***	
Hanse—J统计量	—		—		52.17***	
样本量	972		972		972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这里的家庭人均收入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生显著影响，表3中的模型（2）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农民对政策的信任程度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农民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由表3中的第三列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可知Hanse—J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零，故无法拒绝反映农民政治信任水平的政府信任、政策信任和公职人员信任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且沃尔德卡方统计量为16.63大于对应临界值，表明不存在若工具变量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基准回归结果进行解释，即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存在正向积极影响。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593个百分点，农民的政治信任程度与其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显著正向关系，由此从幸福指数来说，假说H_1得到了证实。农民对政策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334个百分点，农民的政策信任程度与其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显著正向关系，由此从幸福指数来说，假说H_2得到了证实。农民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614个百分点，农民的公职人员信任程度与其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显著正向关系，由此从幸福指数来说，假说H_3得到了证实。

从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表3模型（2）中的

回归结果显示，个体特征层次的政治面貌变量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回归系数（0.0224）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作为一种政治身份，能够拓展农民个人的社交网络、增加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提高个人获取信息的机会，从而提高其社会资本或职业声望，进而促进自身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家庭特征层次的耕地质量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回归系数（0.0491）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家庭耕地作为农民生活保障的基础，其质量的高低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家庭特征层次的家庭是否为移民户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回归系数（－0.0654）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种负向影响说明移民搬迁家庭可能因背井离乡而使他们在心理上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村庄特征层次的村庄类型变量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回归系数（－0.0562）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种负向影响说明城镇驻地和城郊结合地的农民相较于普通村庄的农民而言会有更多接触城市生活的机会，在心理上会出现城乡生活落差感，而且失去土地的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忧虑。村庄特征层次的村庄经济发展变量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回归系数（0.0793）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村庄经济发展作为表征农民生活环境好坏的重要方面与农民生活质量和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直接相关。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回归结果和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回归结果的对比中能够看出，两次估计结果中显著的控制变量基本是一致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研究实证研究部分控制变量选取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三）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计量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性，参考已有关于农民幸福感实证研究结果稳健性检验的文献[27-28]，本研究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指数进行新的变量替换。用受访农民样本对自身是否处于幸福状态的主观判断替代前文利用多层次识别方法获取的农民幸福感状态，在调查问卷中农民对自身是否处于幸福状态的调查问卷题目是“总体来说您觉得自己生活是否幸福”。用受访农民样本对自身幸福程度的主观判断替代前文从多层次视角出发加权计算获得的农民幸福感指数，在调查问卷中农民对自身幸福程度判断的调查问卷题目是“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自己当前的生活很幸福”，程度从1（强烈不同意）到7（强烈同意）逐级增加。考虑到农民幸福状态变量仍然是二元离散变量，所以在估计方法选取上仍然使用Probit模型估计政治信任因素对农民幸福感状态的影响，考虑到农民幸福感程度变量类型变为多值选择变量，所以选取多值响应Ologit模型估计政治信任因素对农民幸福程度的影响。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农民幸福感状态（Probit模型）		农民幸福感程度（Ologit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常数项	4.7491	4.3406	—	—
政府信任	0.2571*	0.1245	0.6790**	0.2311
政策信任	0.4845***	0.1128	0.8663***	0.1435
公职人员信任	0.4149***	01544	0.4271**	0.204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LRχ2检验	171.64***		372.47***	
P值	0.0000		0.0000	
（伪）R^2	0.2463		0.2045	
样本量	972		972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

由表4中农民幸福感状态的回归结果可发现，使用受访农民样本对自身是否处于幸福状态的主观判断变量替代前文利用多层次识别方法获取的农民幸福感状态变量后，政治信任方面的政府信任程度、政策信任程度和公职人员政治信任程度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且影响方向和表2中模型（2）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由表4中农民幸福感程度的回归结果也可发现，用受访农民样本对自身幸福程度的主观判断变量替代前文从多层次视角出发加权计算获得的农民幸福感指数变量后，政治信任方面的政府信任程度、政策信任程度和公职人员政治信任程度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程度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且影响方向和表3中模型（2）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这说明本研究的回归结果是可靠的，研究结论也是较为稳健的。

五、结论及启示

基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972份农民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政治信任因素对农民

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政府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之间呈正向关系，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越会觉得政府注重农业生产、重视农村发展和关心农民的生活，心理上会更加幸福；政策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政策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之间呈正向关系，农民对政策的信任程度越高，越会提高其对惠农政策提升个人福祉的心理预期，增强自身在国家发展中的存在感，心理上会更加幸福；公职人员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公职人员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之间呈正向关系，农民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越高，越会相信权利规则和社会的公平性，对自己生存的社会环境会充满更多预期，心理上会更加幸福。另外，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除了受到政治信任因素影响外，也收到了农民个体特征层次的年龄、政治面貌，家庭特征层次的家庭耕地质量、家庭是否为移民搬迁户，村庄特征层次的村庄类型、村庄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启示：政治信任作为凝聚人心、增进政府与民众互动、实现社会团结的重要因子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治信任的缺乏会直接降低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因此在农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有必要考虑政治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增强农村社会的政治信任。首先，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履职能力，完善政府部门的绩效管理制度，逐步推进政府涉农相关信息公开，重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交流互动，以破除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心理防线。其次，科学制定相关涉农政策，加强政策实施的精准性和政策执行效果的普惠性，拓展政策的宣传和解读渠道，降低农民对政策的误解和疑虑。最后，加强对涉农相关项目的审计力度，严惩公职人员的贪污腐败违法行为，重塑公职人员的角色定位，鼓励公职人员积极作为，弱化农民与公职人员之间的隔阂关系。

参 考 文 献

[1] 罗伯特·莱恩．幸福的流失[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7：339-342.

[2] Frey B S，Stutzer A．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2，40（2）：402-435.

[3] 郑建君，赵东东．政治信任与中国公民选举参与的影响关系——基于参与意愿与社会公平感的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6）：30-38.

[4] Clark A E，Shields M A．Relative income，happiness，and utility：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8，46（1）：95-144.

[5] Dutt A K．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by Luigino Bruni and Pier Luigi Porta[J]．Eastern Economic Journal，2009，35（1）：129-131.

[6] Ryan R M，Deci E L．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1，52（1）：141-166.

[7] 马得勇，孙梦欣．新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决定因素——透明性、回应性抑或公关技巧?[J]．公共管理学报，2014，11（1）：104-113，142.

[8] 梅立润，陶建武．中国政治信任实证研究：全景回顾与未来展望[J]．社会主义研究，2018（3）：162-172.

[9] 芮国强，宋典．政府服务质量影响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J]．学术界，2012（9）：192-201，289.

[10] 章秀英，戴春林．网络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路径——基于9省18个县（市）的问卷调查[J]．浙江社会科学，2014（12）：94-100，158.

[11] 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5）：79-86.

[12] 池上新．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J]．社会，2015，35（2）：166-191.

[13] 贾衍菊，李昂，刘瑞，等．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3）：171-183.

[14] 钟文晶，罗必良．公共政策及其响应：基于农民信任机制的解释——以农地确权政策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20（3）：42-59.

[15] Bounding K E．David Easton．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New York：John Wiley，1965[J]．Systems Research & Behavioral Science，2010，13（2）：147-149.

[16] 李艳霞．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4，11（2）：16-26，139-140.

[17] Nunkoo R, Ramkissoon H. Power, trust, social exchange and community suppor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 (2): 997-1023.
[18] 祁玲玲，赖静萍．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J]．学术研究，2013（7）：52-58.
[19] Warr P. Age and occupational well-being[J]. Psychol Aging, 1992, 7 (1): 37-45.
[20] Luo L. The meaning, measure, and morrelates of happiness among Chinese people, 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997, (1): 115-137.
[21] Chou, Kee-Lee.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young adults[J].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999, 160 (3): 319.
[22] 邢占军，张干群．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J]．南京社会科学，2019（7）：52-60.
[23] 李艳霞．政治信任生成的心理机制与实践悖论[J]．中国行政管理，2013（5）：104-107.
[24] 郑建君，马璇．村社认同如何影响政治信任？——公民参与和个人传统性的作用[J]．公共行政评论，2021，14（2）：135-153，231-232.
[25] 张彤进，万广华．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J]．江苏社会科学，2020（3）：111-120.
[26] 王琼，黄维乔．农民创业更幸福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3）：99-110.
[27] 程名望，华汉阳．购买社会保险能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吗？——基于上海市2942个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0（2）：46-61.
[28] 许海平，张雨雪，傅国华．绝对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的微观经验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20（11）：56-71.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trust on farmers multi-level happiness——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Gansu and Ningxia

LI Baojun[1], CHEN Qiulin[2], WANG Bo[3]

(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4, *China*; 3.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Improving farmers' well-being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so the main content of government work. Based on the data of 972 farmers' micro-social survey in Gansu and Ningxi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trust factors and farmers' multi-level happiness state by using the Probit model, analyzes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trust factors on farmers' multi-level happiness index by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trust in govern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multi-level happiness: when farmers' trust in government increases by 1 percent, farmers' multi-level happiness index will increase by 0.0593 percent. The degree of trust in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multi-level happiness: when farmers' trust in policy increases by 1 percent, the multi-level happiness index of farmers will increase by 0.0334 percent. The trust degree in public official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multi-level happiness of farmers: when the trust degree in public officials increases by 1 percent, the multi-level happiness index of farmers will increase by 0.0614 percent.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rural reform, breaking down the mental defense of farmers and the government, reducing farmers' misunderstanding and doubts about policies, and weakening and ending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farmers and officials will be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improve farmers' multi-level happiness.

Keywords: Political trust; Multi-level; State of happiness; Happiness index

（编辑：牛晓霞）